

政府需加快推進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

議事論事



最近香港民間呼籲正常通關的聲浪日高，但有部門依然缺乏決斷。對香港跟隨內地「健康碼」的做法猶豫。在處理整個事情上瞻前顧後、患得患失，「把簡單事情複雜化」；在以民為本的執政自覺上也似乎有欠缺。

須徹底拋棄「小政府」心態

另外，立法會日前三讀通過《2021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令香港立法規管劏房租務、保障劏房戶基本權益邁出一小步。不過，對於政府和立法會共同完成劏房租管的首次立法工作，社會上有一些不同意見。居住劏房者都是社會最底層，除了居住條件以外，他們的基本居住權益長期得不到保障，社會各方理應給他們更多的關愛。此次法例沒有訂

立起租金，續租期也沒有充分考慮保障輪候公屋的劏房租戶等，令許多人失望。相比較而言，政府施政報告提出的建設北部都會區，連接當下和長遠，兼顧發展和解決當下深層次問題，立足香港發展也融入深圳及大灣區，有遠見、有視野、有大局觀，體現有為政府的大作為和對歷史的擔當，獲得全社會廣泛讚譽。

這些看似矛盾的政府作為，或許可以看到政府在走向進步中與根深蒂固傳統思維的拉鋸，看見政府在宏觀決策上的新思維和在具體事務上依然的「小政府」心態。隨着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與選舉制度的完善，香港撥亂反正效果明顯，政治環境向好，特區政府施政有明顯改善。但一些長久的積弊，一些慣性思維與做法依然存在，還需要不斷革弊求新。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國慶前夕走訪基層的話語猶在耳邊。他說，香港解決住房問題，雖涉及土地、規劃、投入等具體問題，但最根本的、起

決定性作用的，還是發展為了誰的問題，只要牢固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具體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的。

駱主任此處講的是土地住房問題，但對特區政府的其他所有工作都有警醒意義。香港發展為了誰，政府施政為了誰？這是當政者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駱主任給出的辦法是，只要牢固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具體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的。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方略。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在《之江新語，為民辦實事成於務實》中引用古代先賢的話：「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治民者如果樂於做民眾喜愛的事情，民眾也會與其同樂；治民者擔憂民眾擔憂的事情，民眾也會為其分憂），來強調以民為本的重要性。

中央政府在國家治理上，一向強調堅持人民至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無論是

抗擊疫情的努力，還是實現全國整體脫貧，全面實現小康，都體現了「為了誰」的問題。正是如此，中國民眾對政府的認可度和支持度不斷提升，政府的施政效力也更加明顯，國家凝聚力不斷增強，並不斷走向進步、強大。這樣一種「良性循環」，將中國帶向民族復興的偉大道路上。

認清施政「為了誰」的問題

作為國家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治理者，特區政府及其公務員同樣需要解決「為了誰」的問題。「任一官，造福一方民眾」，是當政者的基本政治道德和職業要求。特區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應是為了香港繁榮穩定，民眾安居樂業，為了香港市民的幸福和美好未來。

政府施政以人為本，並非一句口號。首先要有擔當。只要是民眾所需所想，就應以事不避難的勇氣去克服困難，解決

問題。以正常通關問題為例，為什麼做不到與內地抗疫的思路和手段接軌呢？官員顯然是有「顧慮」的。但這些顧慮有沒有考慮香港多數人的訴求，有沒有考慮對內地抗疫大局的影響呢？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多元社會，以少數人對與內地正常通關的抗拒，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這樣的選擇無論如何都不會得到社會大眾認同，無法體現以人為本。

融入大灣區已經成為趨勢，香港也有更多人支持和接受。北部都會區的規劃出台，意味着未來需要更廣泛更深入的融合，對於體制機制的改革力度會更大。這是「一國兩制」與時俱進的新局面。但是，如果連疫情管控的接軌都畏首畏尾，香港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如此的困局不是廣大市民所樂見的，也必然不是中央所希望的。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中大暴徒「陳情書」歪理連篇

議論風生

文兆基

兩年前的11月11日，中文大學被暴徒佔領，並與警方爆發衝突。及後，五名中大學生劉晉旭、高梓斌、陳釋輝、許貽穎及符凱晴，被控於二號橋及環迴東路一帶參與暴動及違反「禁蒙面法」，早前分別被法院判監四年九個月至四年十一個月。判刑前大部分被告都有求情，除了次被告符凱晴，她不單解除了代表律師職務，更親自在庭上讀出所謂的「陳情信」。

符凱晴在信中表示，她不認同法律本身，對自己行為並不後悔，亦認為判決不合理。又指，在部分人眼中，「「示威者」犯法就係犯法，就係要負責」，但她認為，權威不代表正確，形容「極權」下的法律只是「立權用以規範人民行為的不流血暴力手段」，若法庭認為重判可令她反省及後悔，「悉隨尊便」云云。「陳情信」被部分立場偏頗的「黃媒」廣傳，並獲得支持亂港勢力的「黃絲」讚許。

戴耀廷歪理害人不淺

可是大家只要稍懂法律和法理學知識，便不難發現符凱晴的言論，其實是歪理連篇。首先，香港的政治體制，雖未達至基本法訂立的終極目標，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均是從選舉產生，決不是什麼的「極權」，甚至連威權政體也算不上。符凱晴把香港的政體視為「極權」，並以此作為自己不認同現行法律，毋須遵守的理據，本身便是一種認知偏誤。

其次，是符凱晴的一套只不過是鸚鵡學舌，分明是受到非法「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多年來散播的「公民抗命」等歪理邪說所誤導。如此一來，她又何嘗不是盲從「權威」？況且，符凱晴很有可能沒細讀原典，於是對於西方「公民抗

命」學說存有誤解，才會講出一堆似是而非的歪理。

其實，所謂「公民抗命」乃是由自然法學派的法律哲學觀點發展而來。古典自由法學派認為，造物主創立萬物，所以宇宙一直運行着一套自然法則，任何世俗制定的法律，假若違反這一套能夠體現造物主公義的自然法，人們可不視之為必須遵守的法律，這也是自然法學派主張「不公義的法律不是法律」（unjust law is not law）的思想來源。

後來隨着基督神學在歐洲的影響力開始式微，自然法學派亦由過去主張法律須體現造物主的公義，演變成保障「天賦人權」。當中，所謂「天賦人權」主張的背后，本來亦蘊含神學色彩，只是其色彩後來被淡化，變成了主張每人均有與生俱來的平等權利，法律應當保障這些權利，才是符合「社會公義」的法律，否則便是「惡法」。

直至十九世紀開始，西方開始出現「公民抗命」的主張，認為群眾假如面對一條「惡法」，而又無法循現有建制的合法手段修訂時，可以透過故意不遵守的方式，以此凸顯那條「惡法」的不公義。時至今日，「公民抗命」概念逐漸奉行普通法系的國家和地區接受，當中包括香港，但是根據「公民廣場案」的終審法院判刑，行使「公民抗命」必須符合和平、非暴力的條件，違法者事後亦要接受法庭懲罰。

假如示威者的行動涉及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破壞社會安寧，他們便已跨越合法表達意見的界線，「公民抗命」或履行言論、集會自由等辯解，將不能成為有力的減刑理由，即使重判阻嚇性刑罰亦不為過，箇中的法律哲學原理，是「公民抗命」既然是追求「社會公義」，而暴力勢必損害他人生命、財產和權利，亦即是會

侵犯他人的「天賦人權」，所以被劃入禁止之列。

換言之，即使同樣是質疑「犯法就是犯法」，「公民抗命」的主張者都不會像符凱晴一樣，以法律制定過程有多少的民意授權，衡量一條法律是否屬於「惡法」。是故，暴動罪設立的目的本身，乃是維護其他公民的身體、性命、財產和權利不受傷害，讓他們可以在其他人參與集會、示威和聚集時，可以過他們想過的日常生活，可見這條法律本身，符合自然法學派所主張的「社會公義」，市民亦有遵守的義務和必要。

教職員必須依法宣誓

至於判處監禁，讓犯罪人承擔刑責，或者讓其有所反省，只是作用之一，建立法律阻嚇力，透過增加犯罪成本，令思想正常的人不敢造次，才是法律最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由於人類社會的歷史經驗說明，社會上總有一些人冥頑不靈、教而不善，所以監禁的其中一個作用，是把一些具有反社會人格的匪徒拘禁起來，免得他們在外面繼續作案，繼而危害社會。

由是觀之，符凱晴的「陳情書」說明，讀書未必一定能明事理，甚至有可能讀壞書，或者受到一些立場偏頗而又居心叵測的所謂「學者」荼毒。正因如此，除了嚴正執法，依法懲處違法分子之外，改革香港現行的教育制度，將教職員納入必須依法宣誓的社會公職之內，並且建立監察機制，亦是當務之急。只有將那些因其政治偏見或野心，於是故意散播歪理，恣意年輕人不守合法命令的人，逐出教育隊伍之外，才能避免我們下一代受其荼毒，走上犯法的不歸路也！

時事評論員

金融人才多元化助香港金融中心飛躍



黃元山、廖美香

全球正處於新冠疫情大流行，經濟不穩，但科技發展卻一日千里。香港要確保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正視金融科技、ESG以及跨境理財的人才培養是箇中關鍵。面對數碼銀行正在崛起，傳統銀行正處於轉型之中，對金融科技人才需求殷切。此際，世界地緣政治不明朗、環境氣候的變化、金融監管的收緊，令金融機構不得不正視環境、社會及管治（ESG）。為了拓展業務，銀行界洞悉跨境理財的趨勢、風險產品的需求，這都促使業內紛紛增聘人手。

香港正在強化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中央早前派出官員來港宣講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推進大灣區綠色金融。特首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擴大跨境人民幣資金雙向流管道，離岸人民幣產品和工具發展，包括研究提升發行及交易人民幣證券需求、容許「港股通」南向交易的股票以人民幣計價等具體措施。此外，特區政府支持港交所與廣州期貨交易所就碳排放交易相關金融產品開展合作，冀提升香港作為區內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樞紐。政府也會推動跨境金融科技，與內地積極研究建立一個一站式沙盒聯網，便利粵港澳三地的金融機構及科技公司測試跨境金融科技應用項目。

金融發展局早前就未來職場展望發表金融人才報告，認同金融科技及ESG是未來金融服務發展的兩大趨勢，業界對前景感到樂觀，但認為現有本地僱員若未能拓闊知識、加強創新能力及提升追求成功的動力，其競爭力也會下降。報告提醒金融機構須加快速度碼化的步伐，

金融科技不僅是涉及編寫程式，而且可計算產品組合、數據分析、業務效率及準確程度，甚至可計算超額收益，增加理財客戶的體驗；本港金融界須為未來發展做好準備。

雖然本港金融前景充滿機遇，但現今仍面臨一些挑戰。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表示，本港銀行業目前較缺乏三個範疇的人才：綠色金融、金融科技及大灣區。他估計，未來三至五年內，約有10%中後台及5%前線人員需要轉型，合共約八千至九千人，本港業界需加強培養新血。

面對全球經濟變化，人才轉型的勢頭，團結香港基金於九月發表《跨界人才政策產學資歷互通》報告，提倡本港要培育新人，在職人士也要致力終身學習，以提升本港發展的競爭力。基金會認為，「當前大學畢業生和社會人才需求出現錯配情況，建議本港資歷架構須融合學術資歷與行業標準，讓院校所提供的課程能與業界的需求，相互配合。政府應以身作則，將資歷認證等級納入其人才招聘、晉升、採購及發牌等要求之中，以提升應用資歷的認可性。

我們樂見施政報告提出，特區政府會研究為金融科技行業在資歷架構下建立專業資歷標準，讓僱主及從業員有更清晰及認可的專業發展階梯，並同時把更多金融相關課程納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吸引更多人才投身這行業。我們期待，政府加快推出銀行專業資歷架構下的「金融科技」新單元，並積極研究制定「綠色金融」單元，期望於數年內本港能具備多元的基本金融人才，以確保金融優勢得以充分發揮。

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團結香港基金執行總編輯

伯恩斯鼓噪反華有辱出使中國使命

中美關係

張敬偉

作為拜登政府提名的新任駐華大使伯恩斯被中美各界人士寄予厚望，畢竟，在當前中美關係氛圍下，美國駐華大使的使命很重要，不是製造摩擦的麻煩製造者，而是改善兩國關係的建設者。現在看來，伯恩斯的表現令人失望，他尚未出使中國就有辱使命。

大使不應是麻煩製造者

10月20日，伯恩斯在出席國會參議院聽證會時，對中國內外政策進行了系統性的抨擊。他稱中國是美國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指責中國在新疆「種族滅絕」，污蔑中國在香港「失信」，抨擊中國在疫情調查上「搪塞世界」。強調美國要增加對台售武，讓台灣變成「攔不開的堅果」。對於中國和鄰國關係，伯恩斯認為中國對印度、日本、菲律賓、越南等構成威脅，甚至使用「侵略」一詞。此

外，他還認為「中國朋友很少」，美國不要害怕中國，中國「不可信」美國「要自信」云云。

伯恩斯的對華言論，是重複拜登政府的陳詞濫調，說白了就是內政外交上抹黑中國並拉起盟友圍剿反華。國會山的兩黨政客可以鼓噪反華怪論，因為這是他們彰顯政治存在的憑藉。美國智庫和媒體也可以通過「生產」反華觀點推銷自己或吸引公眾眼球。甚至，白宮和國務院也可以製造反華議題達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作為美國駐華大使，可能不能成為鐵桿反華分子。駐華大使不僅是美國派駐的使節，也是兩國溝通聯繫的紐帶，具有化解兩國分歧、消除兩國誤解和破解兩國矛盾的作用。簡言之，大使的責任固然是為了本國利益，但其職責是建設者而非破壞者。

伯恩斯是美國資深外交家，甚至被認為「夠格做美國國務卿」，因此他不應該像特朗普時期的鷹派政客那般莽撞，也不能如國會山的反華政客一般莽撞。信口開河大嘴巴是外交家的大忌，駐華大使發出

毫無顧忌的反華聲音，更是有違其職業道德和專業素養。有着30多年外交經歷的伯恩斯，曾任助理國務卿、美國駐北約大使、美國駐希臘大使及國務院發言人，他還未上任就發出肆無忌憚的反華聲音，讓人懷疑美國外交界失去理智變得瘋狂了。

65歲的伯恩斯，到了「耳順」之年，在國會參眾兩院充溢反華聲音的情勢下，他應該發出真實理智的「逆耳」之言，中和一下參議院的反華氛圍。作為提名的美國新任駐華大使，伯恩斯有責任客觀評價中美關係，強調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和建設性，給中美關係注入正能量，而不是鼓吹反華刻意擴大美國對華敵意。不排除，伯恩斯這麼做是為了讓參議院更順暢地通過他的提名。但是，這不僅暴露了他的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政客本色，也有損其職業外交家的聲譽。

政治正確疊加個人私利，美國已無政治家的外交家，只有反華政客。伯恩斯用自己賣力的反華表演，讓人看到了一位令人尊重的職業外交家的消失，也看到了一

位反華瘋狂和政治秀的投機政客的誕生。這樣的人來到中國，他再強調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中美關係正常發展云云，還有誰會相信？

應積極推動兩國關係發展

伯恩斯的反華怪論，不僅搞砸了自己的職業外交家聲譽，也給中美關係帶來了大麻煩。

拜登政府在駐華大使選擇上是謹慎的，否則不會選擇伯恩斯這位資深外交家。經過特朗普時代魯莽鷹派外交的挫折，美國外交遭遇整體性塌方，不僅中美關係惡化，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外交關係也出了大問題。拜登入主白宮後，宣布「美國回來」，陸續重新加入特朗普退出的各種「圈」。拜登既是為了結盟反華的需要，也是基於修復和盟友的外交關係。

無論是國務院外交團隊還是駐外大使——尤其是重要國家的大使，拜登政府都在盡量回歸傳統和理性。雖然中美關係

依然糟糕，拜登政府不僅繼續延續特朗普時期的對華貿易戰和科技戰路線，而且在外交和地緣政治層面，加大布局對華施壓力度和包圍圈。但是，經過中美外交變輪的「火併」，拜登政府也不得不接受現實。拜登政府公開承認，雖然美國對華展開極端競爭，但美國無意和中國展開「新冷戰」。

中美元首外交連線，中美外交、經貿和軍事層面的溝通，中美關係逐漸回歸門而不破新常態。而且，中美兩國也達成了元首會晤（視頻）的共識。在此情勢下，拜登政府選擇伯恩斯作為駐華大使，不是派出一個反華的鷹派分子，而是為了解決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為美國對華外交提供解決方案，或者說是為了避免中美兩國談判為中美關係注入確定性。

伯恩斯尚未出使中國就有辱使命，若不轉換思維恐會成為中美關係的麻煩製造者。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